

序二

屈文生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前拜读过莊钦永先生著《“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一书。莊先生就郭实猎的姓名¹、传教士作家、时政撰稿人等身份的精致研究，令人叹服。眼前这部《四不像“大英（国）”及其它：新教传教士译笔下的新词》面向中西交流史、翻译史、现代汉语的形成、语言接触史等多个领域，凸显翻译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远非可以简单的文字转码活动来概括。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来看，翻译经常是一种政治行为、历史事件，深刻影响清季中国的外交、内政，表明翻译对中国进入中国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作用。莊先生用功之勤、笔力之深，令人敬重。

早期中外旧约章中，国家名称的翻译是两方角力的重点所在，西方列强无不喜在其国名前添以“大”字，以与“大清”“敌体平行”。例如，“葡萄牙”曾译“大西洋国”，“美国”曾译“大合众国”、“大美国”，“法国”曾译“大佛兰西国”、“大法民主国”，“俄罗斯”曾译“大俄罗斯国”，“日本”曾译“大日本国”。上述这些以“大”开头的“以中格西”的译名在如今的著述、报刊中几乎不被提及。

但直至今日，各类媒体（包括自媒体）似乎对“大英（国）”这个译名尤为“迷恋”。事实上，书刊、报章上习以为常的“大英（国）”，并非自始即是 Great Britain / The United Kingdom 的恰切译

¹ 关于郭实猎的不同汉名，参见莊钦永：《“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第2页注2。

名，对二者对应的认识图式（schema）的确立，有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诞生背景、书写实践。莊先生在本书中娓娓道来的，恰是这一认识图式的历史渊源，及其在中英两国政治外交中所扮演的不可忽视的角色。翻译借助不平等的现实政治空间（条约交涉），经由译者的深思熟虑、精斟细酌后，将“大英国”注入政治意涵，成为富含政治与外交战略性的译名，以取得英方孜孜以求的与中国“敌体平行”。

不仅如此，中国对“大”字的维护和英国对“大”字的竞逐，体现出两国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念，后者“敌体互待”的追求也促使中国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权国家概念和全球秩序和逐渐有了认知，并将之适用于国家构建之中。可以说，从“英吉利”到“大英（国）”的译名转变，埋下了清朝中国世界观变革的种子——对“海外诸国”的理解和交际，由朝贡体系下的互市往来，转变为条约体系下的邦交平等。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载有清朝世界观的会典当中。例如，《嘉庆会典》中作为“朝贡国”、“互市国”的“荷兰、缅甸、西洋（意达里亚、英吉利国）”，在《光绪会典》中被改为“邦交”之国。

道咸时期，清廷普遍认为英国与缅甸、暹罗、越南等一样，皆是名义上或事实上的互市之国，而绝非与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势均力敌的国家——有着政治上平等地位。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以后，原先的“互市”变为“通商”²，二者字面上皆有商贾交易、互通有无之意，但二者所处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前者基于天朝上国抚恤恩义的天下观，后者则基于欧洲国际法形成的主权秩序。英国不可能满足于宗藩体系下的互市，而是迫切希望打破清朝的旧体制，将中国拖入国际大家庭内，按照欧洲程式往来。这一切不能说没有体现于“英吉利”到“大英国”的转变上。

² 见《南京条约》正文第2、10及12条等三处，如“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这些年来，受莊先生的启发，我也在近代中英关系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特别是在中英不平等条约翻译史领域。近代中英交涉中，两国常就“大英”、“钦差”等“小词”展开多番较量，这是因为“小词”攸关国格、事关体制——“词小事大”，“小词”上的失败足以撼动其依赖的、被依赖的“体系”。《南京条约》订立以后，中西关系发生巨变。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而以后他们也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³ 这固然体现出两国力量的消长和西方对待中方姿态的转变，但特殊地呈现在小词的翻译上，这也促使我们思考翻译和历史究竟有何种关系？看似支离破碎的翻译史能否为大历史的书写提供养分？

翻译史料是事实重构和历史真相还原的重要证据样态，基于源文和译文的对比，可以在新语境中实现逻辑重构。但翻译之于历史的意蕴总被忽视的原因或在于翻译研究者缺乏“历史的意识”（historical awareness），未能对历史的构建提出洞见，但历史研究者也可能缺乏“翻译的意识”（translation awareness）。

中外关系研究者处理档案资料时通常自觉或自发地牵涉翻译因素，研究者可能忽视了史料是经过翻译的，而不去首先追究其对应性，惯于信赖译者的“确本”（true copy/translation）标记。一般而言，中外关系史学者的任务是收集、整理经由或未经由翻译的事实，并予以解释，从而构建叙事，使“过去”焕发新的意义。然而，一旦对事实的表达产生怀疑时，便会让我们去追问事实的来源、所采形式的目的及其服务的对象。

事实上，研究者不是与过去对话，而是与过去的遗留材料对话，面对看似真确的符码转换结果，“推断”（speculation）时常参与其中。就中外关系史研究而言，研究者须穿梭在多语空间内，对影响翻译的各类因素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思考，以发现并讲述其获得信任

³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1页。

或不被信任的缘由、过程及意义。历史的语际书写要求研究者须亲历遗留材料的现场，关注“确本”有意或无意，受命或自发，遮掩下的多语对应性，推断其获得信任或不信任等现象背后的内容，挖掘或赋予其新的历时和现时意义。

莊钦永先生多年来，从译词出发，从人物出发，从事件出发，无一不紧扣“翻译的意识”和“历史的意识”，以翻译的视角，历史的关怀，对中西文本交流、程式交流、价值交流有着由微入宏的研究，揭示出一幕幕历史现场，提炼出中西关系史的发展轨迹。我相信，有志于从事近代中西交流的研究者，一定会从莊先生的大著中获得阅读上的快感和智识上的启发。

是为序。

2021年8月23日上海松江